社会经济

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

殷俊玲

[摘要] 清代，晋中奢风甚炽，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风尚的形成是商人直接导引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驱人于商途，促进了晋中社会区域性商业繁荣和区域商帮——晋商的发展，从而使清代晋中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流风久远。

[关键词] 晋中 晋商 奢靡 社会风尚 互动 从众行为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05）－01－0075－11

The Habit of Extravagance of Central Shanx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habit of extravagance was prevalent in Central Shanxi penetrating into all aspects of daily life. This fashion was a direct product of merchant leadership and the habit of extravagance drove people to engage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is improved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merchant clique －Shanxi merchants－ who, in turn, further promoted the habit of extravagance.

有清一代，晋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区域社会，国内最大的商帮晋商就活跃于其间。时至今日，许多学者对成长于斯的晋商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而对晋商成长的地方社会却未予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晋商作为一个称雄数百年的商帮，必然与其所在地发生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诸多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代晋中奢靡之风作一析论，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晋商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在正式展开本文之前，有必要对“奢靡”作一界定。本文的“奢靡”是明清时期传统观念所指，与“奢侈”、“奢华”、“侈靡”同义。依据钞晓鸿对明清方志的考察，它至少有以下含义：1、某事项的花费超过该事项的基本需要；2、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项目与活动；3、某消费与个人的收入不相称；4、消费者攀比浮夸或某事项仪式诡异繁琐；5、违背伦理纲常与等级秩序；6、从事或过分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凡此种种，普遍存在于清代晋中社会生活中，无一例外，且愈演愈烈，流风久远。

一

社会风尚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清代晋中奢靡之风的形成也不例外。

在明初，晋中仍然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其民固守田畴，其俗勤俭淳厚。旧志载：

太原府：“其风勤俭，不好词讼。”①

太谷县：“土瘠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淳厚不奢。”②

[收稿日期] 2004－10－20
[作者简介] 殷俊玲（1965－），女，山西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太原师范学院副教授；太原 030012

汾州府："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3]

从明中叶开始，随着晋商的悄然兴起，晋中习俗开始发生变化。方志中论及风俗时，"勤俭"之词少见，"奢侈"、"侈靡"等词则所在多有：

太原府："省会男子不务蓄积，数金之家尽炫耀服饰之间，妇人尽白髻而妖服，不蚕不织……遇庙会则男妇并肩而骈集……而竞装宴会，而崇侈，物力耗矣。"[4]

榆次县："嘉隆以来，士风险薄，民俗奢侈。"[5]

太谷县："尚气好讼，斗丽夸多。"[6]

平遥县："婚丧大奢。"[7]

介休县："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8]

汾州府："惟是宗室繁衍，渐流怙侈，民间效尤，竞务奢靡。"[9]

及至清代，晋中商人富甲天下，纸醉金迷，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当地消费习尚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性。因此，奢靡之风迅速弥漫，有关当地风俗奢靡的记载频频出现：

太原："近世以来渐及于奢。"[10]

平遥："俗尚浮华，奢风竟致靡极也。"[11]

太谷："宽裕之家，踵事奢华，用度胥流于侈靡。"[12]

榆次："习于浮薄，竞于奢靡，日新月异，竟不知返朴。"[13]

汾阳："民物浩穰，俗用侈靡。"[14]

灵石："自晚清季年，渐习奢靡，迄于今兹，此风尤炽。"[15]

介休："四方商贾辐辏，服物日就奢靡。"[16]

一般说来，凡是大的社会变迁才会在史籍中留下记载，变迁不十分明显的则易被忽略。关于民间风俗奢靡的记载，在清代晋中各县志中俯拾即是，这充分说明当地奢靡之风强劲有力，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

可以肯定，这股奢靡之风的日渐弥漫，与晋中商人兴起的时间表是一致的。由此也可断言，作为晋中民众引颈以望的群体，晋商引领着当地民众习尚的趋向。晚清太原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太谷为晋川第一大富区也，大商大贾多荟萃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故风俗奢侈为诸邑最。"[17]民国时刘天成在《汾阳遗事》中也有详述："农村生活，理应简单，惟商家服饰，多由省外购销（在何处经商，即由何处购销），遂渐渐流为绮靡。东乡在平津鲁豫经商者颇多，故服装仅能稍次城镇，乃一般农家妇女，久被濡染，亦相习为纷华。"[18]此种情形与各地风俗变化是一致的。如在山西大同，民风由"俗尚勤俭"变为"以浮靡相炫耀"，再变为奢侈无度，"其端始于富商，嫁娶衣饰一切务期华丽。"[19]在扬州，"扬人俗尚侈，蠹之自商始。"[20]乾隆《山阳县志》也云："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

这种变化绝非偶然，它是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要求摆脱自卑心理，追求和体现自身价值的结果。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心理自尊的需要，并通过一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以获得群体的好感。

在晋中，无数曹三喜、乔贵发式的经商者囊丰箧盈、志得意满地返乡，向他们的乡邻展示了他们的富有：从锦衣玉食到高楼大院，从面容的谦卑无神到自信有神……由穷变富者的扬眉吐气，在他们身上溢显。这种改变是必然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衣食住行等物质行为，总是与尊卑贵贱密切相连，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生活来实现自身价值并向世人展示自己；统治者也从衣着服饰和居住婚丧等方面作了种种规定和限制，以使尊卑有等，财用有度，人人依礼行事。但是，随着商人们日渐丰盈，他们必然会打破旧有的礼法束缚，追求衣食物用方面的华美，以体现自身价值，改变他们原来在众人心中卑下的形象。日积渐久，欣羡者增多，经商者日众，商人便成为晋中地方社会的凸显群体，他们流光溢彩的生活以广大而耀眼的存在熏染了整个社会，浸浸然衍成风气，从而形成了普遍的奢靡之风。这种情形就是社会群体间风尚的互动。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它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为群体成员在行为、情绪和态度上的统一，在群体成员彼此相互作用下会发生一种类化过程，即彼此接近和趋同的过程。"[21]这种趋同的过程就是互动，也即通俗用语中的"流行"。这种互动发生的规律是：人

们的价值取向、生活观和审美标准总是向社会上层不断趋进。换言之，上层社会群体之间的流行风尚会不断地影响着下层民众的风尚趋向。晋中商人作为当地民众引颈以望的上层群体，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民众，并被悉心效仿，他们追求享乐的消费观念也为民众无声无息地接受，终蔚成一时风尚。

二

物质生活是社会风尚变化的晴雨表，因为任何社会风尚变化的信息总是以物质生活为载体而传递的。晋中奢靡之风首先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物质生活中弥漫开来。

衣着服饰的华丽是人们极力追求的。刘大鹏在其日记中记当地演戏，“妇女满场，衣服无不华丽。”[22]又云：“太原一郡风俗奢靡，太谷、祁县为最，此间左近各村庄奢靡特甚焉，妇女之衣其工费有十数千者。”[23]刘大鹏因为衣着朴素，在太谷每有人讥笑。流风所延，至民国间仍未止息，如日本人所著《山西学术探险记》中就记述了太谷民众的服装之“优雅”[24]。《太谷妇女运动史》中述及太谷妇女时，说她们“一般的都很讲究表面，家里再穷，出来也有一套衣服。”[25]民国时刘文炳所著《徐沟县志》中也述及当地特别注重衣着：“一有喜庆，则服藏衣，妇女尤无不珠玉丰饰”；“平日所衣一以外购，而外布之光怪陆离足以炫愚者之目”。“商人惯用外货，故市之所有与人之所衣，多为外物。而倾筐倒笥，无家不空。”[26]。当地歌谣《看来》中对当地时髦装扮有如此状摹：“看来，洋凉袜子缎鞋，裤儿抽得半腿，两元钱的裤带；身上穿的西法绸，头上抹的生发油。”[27]由此观之，衣着服饰追求华丽与新潮，在当地已然成风。刘天成记述汾阳世事时也描述了“红男绿女，摩登习尚，时露一种侈靡之风”的情形。[28]晋中流传的识字范本《俗言杂字》中对当地所见衣饰有如下描述：

绸缎绫绢锦缎裁绒，哔叽哈喇毯毯洗绒。
大呢小呢羽毛哦噔，山梭布还葛夏罗文。
……
细毛皮皮貂鼠银针，如今衣服俱要时行。
……
辫绳腰带绣花云金，丝线绦子妇人所用。
栏杆衣服袖挽织金，金珠玉石翡翠玲珑。[29]

凡此种种，今人听来也觉繁复华艳。总之，去朴从艳，已成为晋中人的普遍追求。

饮食也极尽所能，追新逐异。于此，商家率先导引。刘大鹏对此屡有慨叹：“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客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诸美味也。习俗使然，并无以此为非者，间有一二不欲如此，亦不得行矣”。[30]又云：“侈靡之风，太谷为甚，各铺户待客酒馔华美，率皆过分，其尤甚者，殆如官常之自奉也。间有俭约者，群焉咻之，以为不合时宜……”[31]“间有俭约者，群焉咻之”！商人欣欣然以奢华为美、竞相攀比之态，跃然纸上。

从流传至今的晋中商贾宴席也可窥昔日商家之奢靡。《河东筵席》中记述了晋中著名的商贾筵席一百单八将席、八十八件海碗席、四四到底席、八八六十四席、八碟八碗席。一百单八将席是108个荤、素、主、辅各菜肴的件数，因“件”和“将”音近，故名“一百单八将席”。兹录如下：

八果碟：温冬　瓜条　佛手片　白葡干　橘子　香蕉　菠萝　苹果
八酒碟：大虾米　仁菜　海蛰　凤爪　松花蛋　火腿　熏鸡　糟羊肉
四蜜饯：蜜枣　金糕　糖梨　杨梅
四利口：水萝卜　黄瓜　莲藕　心里美
八海碗：八仙过海　全家福　鸡汤燕菜　过油肉　三鲜鱼翅　葱烧海参　八宝莲子　酿鱼肚
八热炒：芙蓉鸡片　虾子玉兰　爆炒三鲜　鱼米菜花　蒜苔肉丝　青椒肉片　菠菜豆腐　香菇油菜
八清烩：清汤鱼骨　奶汤银耳　黄耳甜羹　冰糖百合　鸡油四宝　鸳鸯鸽蛋　清烩腐干　白烩苔蘑
八衬饭：燕窝酥　罗丝合子　萝卜饼　玫瑰饼　稍梅　锅条　菜角　水饺
四鱼件：红烧鱼　五柳鱼　沙锅鱼头　炖鱼块
四野味：烤卧龙　卤野鸭　酱山羊　煨鹿

尾

四颈菜：猪蹄颈　牛蹄颈　鹿蹄颈　羊蹄颈

四海味：海螺　鲍鱼　乌参　蛏子

四道汤：状元小饺汤　紫菜鸡蛋汤　杏仁奶酪　梨丝甜羹

八压桌：清蒸鱼　爽羊肉　清炖鸡　喇嘛肉　黄焖丸子　香酥肉　滑溜里脊　雪花鲜贝

四小菜：糖醋蒜苔　腌滴溜儿　腌蒜头　韭花小黄瓜

八蒸食：糖包　花卷　寿桃　佛手　石榴斗天地　蒸馍　马蹄卷

四油饼：葱花饼　脂油饼　千层饼　菊花饼

四面条：削面　搓面　拉面　剔尖

四清汤：鱼骨汤　排骨汤　萝卜汤　白菜汤[32]

上述一百单八将席真是花样百出，规模宏大！水果中有南方的橘子、香蕉、菠萝，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竟有此等稀罕物！还有许多产于外地的珍稀吃食，如海蛰、虾米、火腿、鱼翅、海参、海螺、鲍鱼、乌参、蛏子等。

最普通的交际应酬宴八碟八碗席也是十六道菜，再加一汤四主食：

四素碟：其干银耳　松花蛋　金针腐干　葱油黄瓜

四荤碟：五香鸡块　五香熏鸡　海米香菇白肉片

热菜八大碗：喇嘛肉　八宝莲子　金银宝　红烧鱼　清蒸鸡　樱桃肉　羊肉萝卜　水晶肘子

一汤：八宝粥

四主食：花卷　豆包　酥饼　佛手[33]

商家之奢，并不仅仅在于宴请之时。即使平日里也是“食则包鳖鳞鱼，山珍海错”[34]，并集全国各地风味。如祁县乔家的食谱中集中了京、川、鲁、粤、苏、扬、浙、湘各地菜肴之精华。乔家的正餐，每顿都有山珍海味，用料也十分讲究，如酱瓜要扬州正宗所产，榨丝香菜要来自四川，腐乳、豆豉需购自京、津。无论天上飞的，还是水中游的，抑或是地上走的，举凡所有动物禽鸟和各种瓜果蔬菜都能摆上乔家的餐桌。由于讲究吃食，乔家平常每桌饭都要花上五六十块大洋。[35]

由于商家极力追求美食，故而当地产生了迎合这种需求的诸多特色食品，如祁县东观镇的熏肉、太谷的汤褪驴肉就因专供乔家而名声在外。太谷饼的产生，据说也是由于太谷沟子村员家富商夫人喜欢吃饼，但吃腻了当地的各色饼类。有一制饼师傅听闻此事，便绞尽脑计，将白面、雪花白糖、胡麻油、芝麻、苏打等精心配伍烤制而成，它香甜酥软，甜而不腻。员家夫人食后赞不绝口，从此广为流布，成为馈亲赠友的佳品而流传至今。笔者听太谷沟子村巨商之后人员文绣先生讲，当时太谷的许多食品确是做工十分精细，既费时间，又讲究用料，且品种多样，名目各异。比如糕点，有专门给孩子做满月送的月饼，有孩子种痘用的剥痂饼，有专看病人用的养胃糕、蜂糕；有人去世后送的瓦甬糕、百子糕。且数量惊人，如给孩子做满月送月饼，大户人家要送 500 到 600 斤，拉一大车。他述及自己开的点心铺有一年竟卖出月饼 12 万斤；因他的月饼质量好，竟有榆社等外地人也来购买。过去的许多食品由于用料考究，做工费时，今天已失传了。回想起早已失传的的各种美味，老人啧啧称好，慨叹良久……制做考究的平遥牛肉又何尝不是适应当地食不厌精的食风而产生并广为民众喜爱？

揆情度理，只有当地民众饮食讲究，追求精美，才可能有饮食制作上的精心考究和不断推陈出新，再由商家衍播，进而形成了广大民众普遍的奢侈食风。刘天成记述汾阳生活时写道：“汾俗对于饮食，向好讲究，家庭妇女，且精于烹饪做作。城市多殷实住户，濡染正深，每逢令节，或小有宴会，动辄杯盘罗列，酒肉而外，时鲜嘉果，件件毕陈。”[36]民国《灵石县志》也云：“昔灵俗男耕女织……宴会时器用瓦磁，食无异品……尔来渐习奢靡，无论绅矜士庶……食不登异味者耻。”[37]的确，在这样的氛围中，家家趋奢，人人不免。否则，便会被人耻笑。刘大鹏就记述了自己不随俗的尴尬：“今日请邻里数人、宗族数人办理婚事，饮食全行俭约，而窃然议我悭吝者十之八

九。”[38]又言：“余办理婚事，全行俭约，力去奢侈……鄙意如此，而人皆谓我俭不中礼，悭吝太甚，我则云何。”[39]可见，以奢为荣，已成风气。

衣食之外，居所也是人们悉心营造的立体风采，它以无言的倾诉显示着主人的财势和地位。因此，随着一批又一批商家的发迹，一幢幢高楼大院也拔地而起。主人以充溢的财物穷极土木，使幢幢大院俨然矗立，宛如城郭。如祁县乔家大院，远看俨然一座古堡：四周矗然挺立的高墙厚实而坚固；墙顶建有女墙、垛口、更楼、眺阁，气势非凡。整个院落有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占地8700多平方米，每个大院由三五个小院组成，有体现尊卑长幼的正院和偏院之分，形成院中有院的格局。院内结构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等。屋顶造型变化多端，有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平屋顶等不同样式。院门也是造型各异，有双翅角门、芜栏半出檐门、硬山顶间山门、砖雕跨门等。窗户也是风格多样，有仿照明棂月窗、条栅窗、通天隔棂窗、双开扇窗、挑启窗等；连烟囱都是花样百出：140个烟囱无一雷同，风采各异。整个院落满目都是精雕细刻，到处皆是造化天成。难怪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称之为“清代民居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

榆次常家庄园更是冠绝三晋。它始建于明末清初，乾隆中期不断营造，占地达60万平方米，房屋达4000余间，仅楼房就有50余处。现存常家庄园部分仍然令人心动神往，它简直就是一个建筑艺术博览园。以门式而言，143个院门，样式各异，风采有别：集南北风格于一体的静园正檐挑角卷棚式大门、洋溢书卷之气的书院大门、彩绘门神凸显的养和堂大门、气势非凡的双柱飞檐挑角式贵和堂大门、精致的硬山式谦和堂街门、别有风情的出厦游廊式人和堂大门、匠心独运的二柱挑角带边廊的贵和堂新院大门等等，各具风采的大门数不胜数。大门之中又有许多样式各异的内院门。如歇山门、卷棚门、挑角门、仪门、石柱门、园顶门、梳背门、月亮门、瓶形门、六角门等，每一门上都有精雕细琢的各种装饰。门之外，窗户也是极尽神思，花样百出。有寿字形、喜字形、万字形、灯笼锦、步步锦、冰裂纹、云纹、回纹等，并配以动物花鸟或人物等。真是一窗一景致，满目皆风情。常家庄园还建有北方最大的私家园林——静园，它占地130余亩，兼融中国南北园林艺术之精华，到处都是精美的雕刻，或人物，或花鸟，或楹联，无不赏心悦目。举目可见游廊亭榭，花木摇曳，曲径通幽，再加上湖光映画，清泉欢唱，真乃绮丽灵秀，醉心怡神！如此华美绝伦的庄园，在建筑时自然是一砖一瓦总关情，不容半点马虎。据说当时一个瓦匠一天只准砌200块砖，全部磨棱对缝；每个木工一天只准开10个铆，超过限量就辞退。以这样的精工细作，仅北祠堂的修建就用了三年，耗银达2万余两，商家之豪富与奢华臻于极致！

除此而外，太谷曹家三多堂、祁县渠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太谷孔家宅园，杜家花园，青龙寨山庄，平遥冀家花园等等，同样是美仑美奂，令人叹绝。徐继畬曾以写实的手法作诗述及游冀氏花园时“顿抛愁万斛”的赏心悦目：

入门扶仗行，清冷如入浴。
园约三亩余，花树纵横簇。
桃杏已凋残，白楂正芳馥。
丁香紫白分，寿丹黄似菊。
桃梅逗嫣红，玫瑰香犹蓄。
藤蔓郁虬龙，枸杞双蟠曲。
余树不知名，枝干或已秃。
平地草如茵，马兰兼苜蓿。
又有诸葛采，采之不盈掬。
环坐小亭中，天籁生空谷。
啜茗当春风，萧然远尘浊。
西南有鱼池，冀可濯吾足。
……
同游适我愿，顿抛愁万斛。[40]

真是一个绚丽缤纷的乐园！而徐继畬诗中所摄的冀氏花园景致只是当时无数巨商豪宅风情之一二。

在这些巨商大贾广筑豪宅的影响下，芸芸众生也竭尽所能建楼修屋，尽显华丽。民国《徐沟县志》称当地“比户连甍，望衡对宇”，“楼观争矗”[41]。在平遥，仅城内富于明清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居，至今尚存3797处，由此

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气象。平遥如此，号称“金祁县银太谷”的祁太两县当有过之无不及。如太谷阳邑“里五外三隔过厅”的宅院很多，皆是画栋雕梁，十分讲究；里美庄同样是深宅大院尽显风采，因而有谚云：“阳邑里美庄，真正好地方，一连三进院，梯儿套平房。”[42]日本人在民国时称太谷的建筑是“极其漂亮的，它使人想到欧洲的田园城市”[43]。穿行于今日太谷、祁县、平遥的许多街巷，依然可见许多高深大院。步入院内，访其主人，知道这是其祖上的产业，而其祖父辈竟只是普通的小商人；有的只是农民，农闲时做点买卖，用他们的话说是“穷人”。“穷人”竟有如此好的院落，真让人咋舌不已。1923年出生的柳子俊解放前一直在太谷药铺当伙计，他告诉笔者，太谷城内80年代以前几乎没盖新房，人们住的都是其祖上的房子。民国时刘天成所著《汾阳遗事》中对当地民居概况这样描述道：

> 大厦高楼，每见于城市，外观既已辉煌，内容又复多方粉饰，几席也，古玩也，凡百陈设，均极炫目。其次亦椽题完整，庭堂雅洁，向少颓垣破屋见于其间。究之徒事铺张，无裨实用，殊堪浩叹。[44]

确实如此。当地人不仅在建房盖屋上穷极物力，争相攀比，而且在室内布置上也是尽显阔绰，或强饰华丽，诸如箱、柜、阁、几、桌、椅、案、衣架、衣镜、撑筒、帽筒、茶具、烟具、字画、古董等都尽力陈设，不惜钱财。

日常生活之外，婚丧之事上表现得更是奢侈无度。

刘大鹏记述南席村武家嫁女的妆奁“十分奢华，首饰皆赤金、玉翠、玉宝石、珍珠等物，衣服皆花缎、湖绸、锦绣、绮纨等件，约值五、六千金……目见之者莫不哗然夸之曰，如此嫁女，方不虚生于天地间矣”[45]。众人对武家妆奁丰厚的欣羡，反映了奢华之风已深入人心

平遥城内蔚丰厚掌柜马中选和日升昌三掌柜尹光铎“斗富”一事，也显示了当地的奢靡之风。马氏嫁女时仅嫁妆一项就费银4万多两，送嫁妆队伍500多人，用轿杆抬着数十只衣箱和各式用品，浩浩荡荡开向其亲家尹光铎家。尹家在迎娶时更显阔气：雇有鼓乐队三班，玻璃花轿十余顶，放鞭炮、抬礼品等人员排了足有二里长，礼单写了有二十多页，让过目礼单的礼房先生心中叫苦不迭。在设宴敬酒时，马中选面对尹家上门迎娶的数百人，累得腿都几乎抬不动了，心中禁不住感叹：“爹爹跑断腿，比不上尹家拐（尹光铎之父是拐腿）。”[46]

民国《徐沟县志》对当地婚事奢华也有详述：

> 如婚事，康乾旧志所载：“士大夫肩舆一乘，鼓乐六队，至于庶人止用彩车一辆，鼓乐二对。”乃咸同至今，寻常人家不但鄙车不用，且以一肩舆而增为二肩舆，今则无一家不为四肩舆矣。乾嘉之间，富家陪嫁花瓶高数寸，咸同之间不及一尺，光宣至今皆高三尺，而资财则与为反比例，其他一切无不如此。[47]

上述所言值得注意的是，百姓资财已渐不如前，但婚嫁所用却更行阔绰，这充分说明当地奢侈之风已然愈演愈烈。又云：

> 男女新服，陪嫁妆奁，在乾嘉时富家之奢，实而且华，珠玉币帛，绮绸皮服，冬夏礼衣，无一不具……咸同以后之奢，华而不实，金翠首饰，绸缎时衣，有箧皆满。[48]

从“实而且华”发展到“华而不实”，足以显示当地民众日盛一日的崇奢倾向：华美绚丽为主，实用与否似乎倒在其次。

刘大鹏记述当地风俗时有言：“近来风俗，婚姻丧事，宗宗件件，只是夸其富有，并不惜钱。”[49]即使是农家百姓，“却亦不甚俭约，俗已奢华，不得不随俗而行也”[50]。

丧葬也是讲排场，摆阔气，奢靡无度。史载介休“丧仗繁重，至数里有者，祭筵或至数十桌，远近观者堵墙，富贵之家奢相尚，千金所弗恤；倘财用不足，或致停丧。而商贾好侈，亦复相沿，且饭僧忏佛，虽守礼之家在所不免”[51]。平遥丧礼“侈丽相高，富厚恃贝，动备华细幡纸数百余杆，妆饰象驮，仪卫引路，显神等类繁竖盈街，鲜然耀目，甚至扮戏杂剧，毛女撒盖之饰，只供观娱，哀戚荡然”[52]。“只供观娱，哀戚荡然”，正是丧礼奢

靡的典型反映。徐沟在明万历时“用度知节省”[53]；康熙时，“庶民供作佛事，每至迎经，通衢以张夸美”[54]；至光绪时丧礼“附身务极美”，墓葬“求深固，有穿地至数丈者”[55]。汾阳“无分红白事件，相沿浩繁，徒事纷华”；“有妇女病故，死者亲属俗名娘家人多方刁难，衣食不由俭约，棺椁务极丰隆”[56]，以至屡酿事端，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在榆次，因丧礼隆重热闹，观者如潮，而有“徐沟的铁棍太谷的灯，不如柳堡埋死人”[57]的民谚流传。它说的是榆次柳堡镇富商贾继英之父的丧礼。贾父出殡前，由四方能工巧匠按高级仪仗队形式制作了纸质人马。出殡时，巨形白色纸质哼哈二将领先，白衣骑兵大队随后，楼台殿阁、童仆使女、家俱陈设一应俱全，三十六人抬着金漆棺材，各路乐队竞技吹打，头戴白帽送殡亲友排成白色的长龙大队，挽幛挽联遮天蔽日，长达十数里，形成空前的豪侈场事，当地成千上万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入柳堡，填衢溢巷，道路为之堵塞。

这种状况直至民国间仍然余波不止。交城段村富商马子玉的葬礼仍是盛况空前，令人叹为观止。马子玉葬礼时的礼赞人员岳子权先生对此有难忘的回忆，兹节录几组镜头如下：

> 为了择日发引，单在灵棚祭奠时间，长达一个多月。邀请僧侣多人，逐日诵经念佛，超度亡魂。又请道士多位，亦是唪经感化。僧家五日一次，坐法台，奏鼓乐，念往生咒。道家七日一次，设坛打醮，奏着笙管雅乐，诵金刚经，这是僧道两家的祷祝情况。还有每日家祭和亲友前来致吊时，都须奏乐，是从交城、清源、徐沟、祁县、太谷等地雇来的乐工队，共八班，每班粗细乐工十六人，昼夜轮替，分别奏着锣、鼓、镲、旋、笙、管、笛与丝弦、唢呐等乐器配合成的多种多样的哀乐。
>
> 发丧出殡那天……用从太谷县赁来的深绿色呢围、金镶玉顶双龙杠棺罩。抬杠人员四十八名，都着绿呢制服，戴红毡帽，另外还有领班人，亦是身穿礼服，敲着小铜锣为指导之暗号。抬杠人员听从锣示，将棺木抬入龙杠，一言不发，而抬行过街，又是步法整齐，举止一致，双目直视，形同步兵列阵出操，“威而不猛恭而安”，人皆叹为观止。
>
> 发丧启程……前头有放铁炮的人，骑着自行车为前驱，燃放铁炮三声，即先走去，随着是燃放纸麻鞭炮和发散纸钱的一些人，跟着粗乐工队吹号、击鼓，吹奏唢呐锣镲等乐器。两边打着开道锣，为大形铜锣，每段都有两面随时敲着。乐队之后是“打道鬼”，紧接着是一些人抬着引路菩萨佛龛，抬着死者铭旌，跟着骑红马身背拜帖盒，投递冥帖的报冥官申得英学士。其后为打着牌拱职司，旗、锣、伞、扇及各种銮驾，如金瓜、钺斧、朝天镫、拳头、巴掌、干帜棍，及多种多样的香幡、纸幡和各色各样的纸扎祭品，许多幅挽言、挽幛、挽联执者数百人。接着又是题主官人的前程职司，龙旗、凤旗、红旗、黄旗、飞虎旗及国旗各一对。又有大、中、小形开道锣，大伞、小伞、日罩伞各一柄。有大芭蕉扇上书写着官人头衔、两旁打着“肃静”、“回避”之大方形木牌。跟着一班乐工队伍，奏着笙、簧、管、弦乐曲，后面抬着题主官解莘田举人乘坐之大轿。随着又是祀后土官人的牌拱职司人和吹奏着笙簧管弦乐器的乐工队伍。有大芭蕉扇书写着祀后土官人的头衔。后面抬着祀后土官商运全拔贡乘坐之大轿，又跟着马拉轿车四辆，乘坐着十二位赞礼人员，其中有十位是老秀才，又有头戴孝帽，手执祭香的送丧男宾数百人随行。再后为打着引魂幡、穿着各种不同规格的孝服、拄着哭杖的孝子、孝孙、孝侄、侄孙等，拉着御车白布带的十余人，弯腰曲背，哭行于灵杠之前。还有身穿孝衫搀扶孝子们的女婿、外甥等多人随行，为扶丧者。此后即为堂皇威武的丧杠，由专职抬杠人员四十八名抬着，缓步随行。丧杠后面为送丧之孝妇、孝女、孝孙及侄女、侄孙、甥女等数十名，女戚百余人，乘坐着马车近百辆。前为明车，后为轿车，依亲疏次序，排列随行，哭送于灵柩抬杠之后，如长蛇阵然。最后为迎神轿，

跟着粗细乐工两班，连续吹奏哀乐……发丧队伍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已近千人，而围观者本外各村赶来，约有万人。故一日之间，整个村中，途为之塞，绕行全村街道，约有四五里长。距离坟茔尚有二三里路，队头已入茔地，而队尾尚未离村……[58]

如此张扬的场面在晋中并不少见，它吸引了无数人欣赏的目光，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啧啧称羡的交谈中，无数人悉心效仿，不惜钱财，以博时人艳羡，以逞一时之荣；即使力有未逮者，也得强装门面，不惜债务缠身。否则，就会被人耻笑，遭人鄙视。

晋中奢侈之风还表现在娱乐消费上。许多富商大贾在自家建有戏台，常请戏班演戏，或干脆自办戏班，如祁县岳彩光创办云生班，渠源淦创办聚梨园，榆次王铖的四喜班，崔玉峰的二保和娃娃班、清源时成盘办的小梨园，平遥尹光禄创办的祝丰园等等。他们之所为，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和娱乐，同时更有自我夸显的冲动。在富商大贾的带动下，晋中戏班林立，仅平遥出现过的戏剧班社至少有：协同班、春和园、昌盛源、永福社班、众义园、永梨园、丰仙园、同春园、祝庆园、天乐园、双盛园、祝丰园、同梨园、金仁园、伍梨园等30多个晋剧班社。寿阳至少有西福庆、新梨园、庆梨园、三鸿班、义梨园、宏庆园、锦宜园、乐义园、福顺班、忠梨园、三宏班、义乐园、中福庆、顺梨园、喜顺园、景义园、宏福庆、三义园、锦翠园、忠义园、和盛园、太平班、喜梨园、吉庆园、双胜园、万顺园、翠梨园、英雄班、小红梨园、富梨园、成梨园、双梨园、鸿梨园、喜梨园、小锦梨园、锦义园、仁义园、福胜园、自成园、天庆园、三梨园、福义园、喜盛园、公义园、兴义园、义春园、万春园、四合班、新盛园、景宜园、十股班、武艺园、爱梨园、贵梨园、红义园、双鸿班、金梨园、四喜园等58个戏班。晋中其它各县也不在少数。

虽然晋中各县旧有戏剧班社实数难以确计，但仅从上述所知之数，仍可遥想昔日晋中戏班林立，弦鼓不绝的盛况之一斑。这风采各异的无数戏班整日笙歌不断，活跃于各种庆典之时，诸如开业庆典、周年庆典、婚娶庆典、科考庆典等。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在光绪时因有兄弟二人同时中举，便“优觞贺喜，奎星神前两班戏，其宗祠前一台，不惜银钱”[59]。在城乡无数庙会之时，商家也不惜财力请最好的戏班以助声威，尽显气派；乡民也趋之若鹜，争相观看。相传，聚梨园有一次在祁县城内财神庙演出，观者如堵，许多人被挤得吐了血。有的商家在家祭时也要请戏班唱戏，如太谷任村富商贾氏在其家庙至诚宫每年至少演九台戏。乡间遂有“要看好戏到任村，任村有个至诚宫”的说法。由于任村经商者众，故而家给人足，好戏连台。笔者听1911年出生的武保德先生讲，任村一年中约有九十台戏。每台戏至少三天，总计约有近三百场戏。真是日日戏声震天，天天人声鼎沸。

在商家的推崇和导引下，普通乡民也对唱戏娱乐倾心万分。于是，每一村，每一镇都不惜财力，相互攀比，争相延请戏班唱戏，或自行组织秧歌表演，或组织各种社火游艺，形成了晋中社会红红火火的娱乐盛况。无数人沉缅其中，竟至弃了本业：

——此村有傀儡之戏，弟子因而不来读书。[60]

——晋祠翌日赛会，今日演剧，农工皆歇肩看戏，不愿做工。[61]

——本县城隍庙今日赛会，人多息工，前往城中观剧。麦收之时，人犹若此。[62]

即使生活拮据，娱乐也照行不误：

——晋祠等五六村庄抬阁酬神……骤而观之，似乎家给人足，贺年岁之丰，却不知农皆困顿也，习俗奢华于此见矣。[63]

——里中之人……生活程度之艰难已臻极点，乃都不怕，仍然妄作妄为，奢侈无度。今日闹秧歌，明日唱女戏，以行其乐。[64]

演剧行乐之事在刘大鹏笔端反复涌动，几难计数。虽然我们不能复见昔日笙歌震天的热闹场面，但也可以悬想当年人头攒动，观者如堵的盛况。晋中社会奢风甚炽，此又一证也。

三

晋中社会奢侈之风为有识者深恶，遂有各县府禁奢示俭，以绝陋俗的举措，如平遥有“崇俭”之记载，以后又屡有申饬[65]；汾阳县西陈家庄于民国十二年制定了《改良本村社会暂行简章》，其中禁奢是其重要内容，涉及衣、食、住、婚、丧、娱乐等方面：

——演剧通年只要一次，秧歌等戏，一概禁绝。

——丧事应禁延僧道诵经、糊用种种纸扎及各项浪费，婚嫁庆祝，尤宜节俭，至非分之仪仗鼓吹，均须限制，藉免奢侈成风，民生困难。

——衣取国货，食重菽粟；住房切勿过事华丽，室内不宜多放陈设……家家宜朴素为主，注意积蓄，以防荒旱灾。[66]

禁奢之约的出现，直白无误地说明奢风之盛已成为当地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崇奢之风一旦形成，就不是一纸禁令所能改变的。因为社会风尚是一个时期内群体的绝大多数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喜好和追求，它具有社会性和流行性的特征；它通过从众行为发生作用，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时尚。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在群体中会不知不觉受到群体压力（或是个人臆想的压力），而在知觉、判断和信仰上表现出盲目追随群体中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这就是从众行为。在商者如云、奢风如潮的氛围中，人们争相夸富显阔；即使心有不愿者，但为免于被耻笑被鄙视，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所谓“俗已奢华，不得不随俗而行”[67]，这正是从众行为的典型表现。

这股到处弥漫的奢靡之风使晋中芸芸众生对经商更加心向往之，走利如鹜，以致从男儿一出世，母亲就在摇篮曲的呢喃吟唱中倾情诱导：

俺娃娃亲，俺娃娃蛋，
俺娃娃大了捏蓝炭，
捏不下蓝炭吃不上饭。

俺娃娃蛋，俺娃娃亲，
俺娃娃大了走关东，
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68]

“蓝炭”是指煤炭中未燃尽的炭，“捏蓝炭”是指过去穷人去富家倒出去的煤渣中捡蓝炭以作燃料，捡炭的孩子们经常从头至脚一身煤灰。“吃不清”是晋中方言，即吃不完之意。这首摇篮曲广泛流行于晋中社会，今日各县志仍有记载。在夏夜的纳凉和冬日的消磨中，母亲把灰暗与明艳强烈对比的贫富两种生活以轻歌慢吟的形式呈现给孩子，它饱含了长辈对儿孙择业上的无限期望和殷殷嘱托。

对男儿的期望是“俺娃大了走关东”，对女儿虽不能有如此指望，但却可以通过婚姻的手段使她同样享有“虾米海菜吃不清”的富裕生活，因而对女儿的教育中有歌曰：

咚咚喳，娶来啦，
俺女儿不嫁啦。
不嫁你那掏粪的，
不嫁你那砍地的，
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69]

这是一种弥漫于整个晋中社会的重商气息，它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可却又所向披靡，无孔不入。

待到男婚女嫁之时，又有为新人祝福的颂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期盼：

先拜天地后拜祖，
荣华富贵辈辈有。
买卖开到北京城，
生意做到张家口。[70]

可以说，对子女的教育从小到大，无处不有，时刻都洋溢着晋中民众对商人生活的无限向往，究其实，是商家生活的流光溢彩牵动和吸引了他们。

在荣华富贵诱人的召唤下，家家户户都想尽办法托亲靠友，不惧千里万里，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商号当学徒，学做事，当地语叫“住地方”。虽然当学徒所受的磨难并不比种田郎稍逊分毫。

除了“住地方”学商外，还有无数人或是摆摊设点，或是走街串村，加入了“做小买卖”的行列。太谷秧歌《卖元宵》中唱道：

我小子今年二十七，

家住太谷在城西，
别的营生咱不会，
就会做个小生意。[11]

此外，《卖绒花》、《卖高底》、《打冻漓》、《卖胭脂》等源于现实生活的许多祁太秧歌都描绘了小商人的生活，反映了小商人存在的普遍性。

在这股无往不至的重商洪流冲刷下，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尊卑秩序被冲出了原有轨道：“士”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再如昔，“农”固守本业也不再被人赞赏，“商”逐利于市却让人心存艳羡。于是有谚云：“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又有谚云：“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当地广为传唱的秧歌中就直白地反映了民众对商人的看法，如“人伢的丈夫会做买卖，咱的丈夫就会受苦”；“我小子生来有福气，有福住在票庄上，日每吃的猪羊肉，白面都吃得不稀罕。”前者反映的是村妇对买卖人的欣羡和对受苦人的抱怨，后者则呈现出乡民眼中住票庄的买卖人的优裕生活和骄儿如意态。平遥县还有谚云：“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翔，三子无出息，也是程清泮。”雷、毛、程是日升昌票号的掌柜。人们对富商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流传于晋中的识字范本《俗言杂字》中记述了士、农、商三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其中“士”与“农”的记述仅占很小比例，且认为“士”即使熬到“鸭红顶戴当朝一品”，也是“侍奉君王难以到头”，“想在期间有些滥心”，终归是“辞王别驾要回故土，不愿坐官在家养亲”[12]。对于农民，《俗言杂字》慨叹道：“说起庄稼受苦营生，天旱雨涝收成不定。钱粮差务吃穿逼人，巴巴结结且度光阴。”[13]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农耕生活的无奈。而对于商人生活，《俗言杂字》则用了大量笔墨予以详述细说：从出门行路须知到贸易要诀，从建屋捐官到衣食住行、婚丧娱乐都有详尽的叙述，一桩桩，一件件，描绘出一幅幅令人炫目的动态生活画面。乡村少年在摇头晃脑的识字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画面自然会先入为主，铭刻于心，为日后择业奠定牢固的情感基础。《俗言杂字》对士、农、商三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状描及笔墨轻重的差异，真实地反映了晋中民众对商人生活的情有独钟。晋中商风日盛，以致竟出现开科考生不足额，县府不得不到商号挑选考生以充数的咄咄怪事！

此种情形之发生，一如明代陆楫所言：“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14]张翰在《松窗梦语》中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者众”。[15]介休嘉庆版县志中对此也有阐释：“今物价日腾，而婚丧之用或至十倍于昔，岂操赢居奇者多而相竞为奢欤，抑风会所趋因而用之者？”[16]言中之意，正揭示了商业与地方风尚的互动关系。

概而言之，清代晋中奢靡之风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商人直接导引的结果；而追求生活享受，必然要求有更多的财富累积，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经商致富表现出由衷的认可和欣羡，从而趋之若鹜。这种连续而持久的互动，无疑进一步加速了晋中区域商帮的发展和壮大，也造就了本地区的商业繁荣，形成了门类齐全、品种多样、服务周全的城乡消费市场，而众多商人及其家庭则成为广大而强劲的消费主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晋中浓郁的享乐氛围，无数人浸淫其中，终使当地奢风弥漫，几于不可遏止。

---

①明嘉靖《太原府志》卷9引《一统志》。
②《永乐大典》《太原府志》。
③清光绪《山西通志》卷99引明《一统志》。
④⑥⑧明崇祯《山西通志》卷29。
⑤明万历《榆次县志》卷1。
⑦明万历《汾州府志》卷2。
⑨明万历《汾州府志》卷2。
⑩清道光《太原县志》卷3。
⑪清光绪《平遥县志》卷1。
⑫《太谷县志》民国序。
⑬清同治《榆次县志》卷7。
⑭清光绪《汾阳县志》卷1。
⑮民国《灵石县志》卷1。
⑯清乾隆《介休县志》卷4。
⑰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47页。
⑱《汾阳县志通讯》1986年第3期，134页。
⑲清道光《大同县志》卷8。

⑳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8。
㉑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96页。
㉒㉓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36页、144页。
㉔侯振彤：《山西历史辑览》，太原，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
㉕山西省太谷县妇女联合会编《太谷县妇女运动史》，第1辑，131页。
㉖㉗刘文炳《徐沟县志》民俗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298页、316页。
㉘㊱㊹《汾阳县志通讯》1986年第3期，133页。
㉙史若民：《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635页。
㉚㉛刘大鹏：《退想斋日记》，48页、103页。
㉜㉝张成基：《河东筵席》，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年，79－80页、85页。
㉞刘大鹏：《退想斋日记》，25页。
㉟张巩德：《山西票号综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206－207页。
㊲民国《灵石县志》卷1，风俗。
㊳㊴刘大鹏：《退想斋日记》，37页、38页。
㊵晋中市史志研究院编《平遥古城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430页。
㊶刘文炳：《徐沟县志》民俗卷，302页。
㊷郭齐文：《太谷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282页。
㊸侯振彤：《山西历史辑览》，太原，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296页。
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09页。
㊻王夷典：《平遥票号事略》，《平遥文史资料》第1期。
㊼㊽刘文炳：《徐沟县志》民俗卷，91页、298－299页。
㊾刘大鹏：《退想斋日记》，56页、435页。
㊿民国《介休县志》卷3。
(51)(65)清光绪《平遥县志》卷1。
(53)明万历《徐沟县志》卷上。
(54)(55)清光绪《徐沟县志》卷5。
(56)清光绪《汾阳县志》卷10。
(57)华而实：《汾晋遗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239页。
(58)燕居谦：《交城文史资料》第8辑。
(59)(60)(61)(62)(63)(6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77页、144页、341页、453页、46页、425页。
(66)刘天成：《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14辑。
(6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453页。
(68)刘文炳：《徐沟县志》民俗卷，314页。
(69)史忠新：《平遥览要》，171页（内部资料）。
(70)《文水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20页。
(71)郭奇文：《太谷秧歌》（内部资料）。
(72)史若民：《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637页。
(73)史若民：《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634页。
(74)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转引自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见《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75)张翰：《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6)清嘉庆《介休县志》卷4。